

【人生随想】

那眼井，曾经的井

□林少华

有个地方特别牵引我的视线。

它位于吉林市与长春市之间的101国道差不多正中间，距我暑期度假的小镇大约五公里。每次去长春或九台，无论坐火车还是搭汽车，我都急切切向那里投以仿佛自己都能看见的视线——那里就是“那里”吗？说实话，我已无法准确定位。原来的三面山坡已被彻底开膛破肚，掏空五脏六腑，剩下的边框或摇摇欲坠或豁然坍塌，奇形怪状，寸草不生，比牙科诊所的病牙透视片还要难看。几架采石机直挺挺举起长臂再不下——废弃的采石场。它明确拒绝所有的视线，然而我硬要把视线投过去。投过去搜寻那座小山村、曾经的小山村。

小山村三面环山，唯独南面敞开面对田野和远山，形状如缺了一侧的漏斗。几户人家的茅屋零散坐落在“漏斗”底端。只有我家那座似乎心有不甘地贴着西山坡往上爬了一点点。“漏斗”的缺口伸出三条路：中间一条有牛马车辙的直路往南通向三四百米远的公路和铁路，两条荒草没踝的小径沿两侧山脚分别往东南和西南两个方向蜿蜒伸去。北山坡和东坡是以橡树为主的原生杂木林，西山坡则满是碗口粗的落叶松，松叶一年年落下来，平展展、软绵绵的，乡亲们叫“松毛”。那是我小时候的“席梦思”——捧一本书席地而坐，做梦，遐思。毛茸茸撩人情思的毛咕嘟花，细毛刷一般拂过脸颊的山风，娇滴滴的鸟啼，脆生生的蝉鸣，羞答答躲闪的覆盆子和气鼓鼓爬上树梢的山葡萄……

不过，此刻我眼前闪出的是那眼井。

那眼井位于“漏斗”底部约略靠近南侧缺口，离我家最近，穿过菜园子再跨过一条沟即是。沟是山水冲出来的，起初很深，在一个孩子眼里简直是大峡谷。上面横一条独木桥，那是北山坡下一位老伯的“奉献”——老伯名叫张喜，“地主”出身，常年穿一身整洁的青色长衫，面相和善，和我爷爷谈得来，常来串门儿。一次，他考小学低年级的我“埋汰”（脏）怎么写，看我用木棍在相当埋汰的地面写出“埋汰”两个字，就笑咪咪俯下身子摸着我的脑瓜顶夸说：“好小子，长大了保准有出息！”可惜没等我出息时他就离世了，身后留下的独木桥，乡亲们用了好几年。山那坡的乡亲们过桥沿我家篱笆外那条小径走去火车站，母亲走出篱笆豁口过桥担水。

井太简单了，简单得就剩下一个“井”字。莫说井房，就连一般常见的轱辘也没有。对了，和《挪威的森林》第一章直子说的井颇为相近：正好位于草地与杂

木林的交界处，地面上隐约闪出的直径约一米的黑洞洞的井口，给青色不动声色地遮掩住了。四周既无栅栏，也不见略微高出井口的石棱。

是的，没有轱辘，没有围栏，没有石棱，只有一个黑洞洞的井口像一张大嘴开在稍微隆起的地面。不很深，大约两米就到水面了，趴在井口可以一晃一晃窥见自己的脸。因没有轱辘，打水用的是自己带去的水桶。水桶拴一条手指粗的麻绳，从井口放下去，“砰”一声碰到水了，就左右摇晃麻绳让桶歪在水里。等手心觉出重量感了，便双手交替着一把一把往上拉起绳子，拉出灌满水的桶，将水倒进另一只桶，把空了的桶重新放进井里，再灌满拉出井口，而后用扁担钩起两只桶担在肩上，过桥担回家去。

那时我还小，弟弟更小，在外地公社（镇）当干部的父亲又经常不在家，担水的重担就落在母亲肩上。独木桥，桥上瘦削的母亲，前后两只水桶，摇摇晃晃，踉踉跄跄，颤颤巍巍——那不是电影，不是小说，不是修辞，而是曾经的日常性现实。后来一场大雨把独木桥冲跑了，母亲只好绕到沟下头，跨过不那么深的地方，拐到井口担水。再后来，整条沟没那么深了，坡没那么陡了，母亲就在原来有桥的地方爬上爬下。最难熬的是冬天，那时东北的冬天格外冷，东北话叫“嘎嘎冷”“贼冷”，真可谓滴水成冰。从井里拉水桶上来时，水难免溅到井口结冰，水越溅越多，冰越结越厚，挤得井口越来越小，有时要砸冰才能把水桶放进去。而担水上下坡，脚下不是雪就是冰，不是冰就是雪，稍不小心就滑倒……我不敢再往下想了。

最后一次见那眼井是在什么时候呢？2001年夏天我从青岛回乡探亲的时候。生活好了，母亲老了，不担水了，脸上有了舒展的笑容。井仍是老样子。我抱起一个大西瓜“咕咚”投进井去，一两个小时后捞出来抱回院子，“咔嚓”一声切开，咬一口，透心凉。那可不是冰箱生成的凉，是井水特有的凉，哪怕天再热，井水也是凉的。母亲也开心地吃了两块——和母亲一起吃从井里捞出的西瓜，一生中仅此一次，一晃儿二十多年过去了。

母亲早已不在了。井也不在了。但真就不在了吗？毕竟，视线以外的地方那么多、那么大、那么邈远、那么深邃和神秘……

（本文作者为文学翻译家、散文家、学者，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有《落花之美》《乡愁与良知》等，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奇鸟行状录》《刺杀骑士团长》等村上春树系列作品以及其他日本名家作品一百余部）

□雨茂

去年参加“新家庭教育汉源论坛”，我是点评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小学校长的陈述，她的学校长期坚持一项活动，要求家长每学期至少给孩子写一封信。我肯定了学校的做法，建议家书用毛笔或钢笔书写，不要用打印稿，因为它没有温度。我举例说，梁启超30年间写了400多封家书，绝大多数都是写给孩子们，其中尤以给大女儿的信居多。任公先生家书都用毛笔书写，信笺选择考究，书法严谨秀美，才情溢出纸外，是真正的“见字如面”。

最令我感动的是梁启超用心营造温情和谐的家庭氛围。他俯下身子跟孩子们交流，称大女儿思顺“大宝贝”，二女儿思庄“小宝贝”，三女儿思懿“司马懿”，小儿子思礼“老白鼻”。梁思顺在夫家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在梁家则是长姐如母，尽心帮助父亲教养弟妹，但她的性格很像母亲李蕙仙，为人刚烈，不懂得变通。她看不惯抛头露面的林徽因，极力反对大弟的婚事，梁启超放下长者之尊，不厌其烦地说服她接受林徽因这个弟媳，言辞恳切，令人动容。当大女儿与弟姐妹们发生冲突时，李蕙仙站在弟姐妹一边，梁启超则坚定支持大女儿，用心维护梁思顺这个“小家长”的权威，抚慰她委屈的心灵，还用幽默的语气弹压不安分的子女们。梁启超颠覆了严父慈母的古训，把慈父严母的妙处发挥到极致。林徽因待梁思庄极亲热，梁启超就去信表扬她是“天真烂漫好孩子”。婚后的林徽因很爱小弟弟梁思礼依恋，梁启超就给远方的孩子去信炫耀。他写道：“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亲热，不解作从前旧家庭虚伪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习气，和我们家的孩子像一个模型铸出来。所以全家人高兴，就和庄庄回家来一般，连老白鼻也是一天挨着二嫂不肯离去。”

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士大夫们表现出来的父爱往往是含蓄蕴藉的，有时甚至僵硬而又压抑，导致亲子关系比较紧张，而梁启超表达父爱的方式却浓烈又洒脱。永葆名士风范的梁启超率性大方，既不忸怩作态，也不惮于暴露脆弱。他与朋友聚会喝醉了酒，就在纸上写满了“我想我的思顺”“思顺回来看我”。他会在信中对孩子们说“我爱你们”“我想你们”“我想我的孩子，想得厉害”“我在病中想他，格外想得厉害”等肉麻话。他还会对大女儿撒娇：“几个月没有饮酒了，回家两天就是你妈妈的生日，我想破戒饮一回，你答应不答应？”在他的生命后期，被病痛折磨得厉害，他给大女儿去信说：“我平常想你还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他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他也不忘回应孩子们对父亲的爱：“思顺这次来信，苦口相劝，说每次写信便流泪，你们个个都是拿爹爹

当宝贝，我是很知道的，岂有拿你们的话当耳边风的道理。”

与时下一些家长强势掌控一切的做法不同的是，梁启超对待孩子们学业与职业的选择十分宽容及支持。梁思庄遵照父亲的意愿到麦吉尔大学学生物，但她并不喜欢生物，学习比较吃力，她不敢向父亲表明，转而告诉了哥哥思成。梁启超知悉后，赶紧去信开导：“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式，你应该自己体察作主，用姐姐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后来，思庄到美国学习图书馆学，成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开创者。思永爱上了考古学，梁启超不仅支持，还赞同他回国参加实习，拜托国内顶尖的考古学家李济之指导他。研究中国现代考古学，梁思永是谁也无法忽略的，他虽然英年早逝，但成就卓著，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当下社会谈及家庭教育，往往推崇赏识教育，但许多人往往浮于表面。而梁启超是真正做到了对孩子们赏识，他总是尊重鼓励，极少打压训斥，“我们家孩子断不致下流，大概总可以放心。”“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受我的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对于孩子们的进步，梁启超的赞扬也是溢于言表的。他希望儿女们广泛地学习各种知识，不要局限在一个学科，激励孩子们阅读各种书籍，接触各种文化，还资助他们到西方各国游历考察。他警示孩子们要保持生活的热情，不要走入“孤峭冷僻”的歧途。

中国人习惯用成功者的事迹激励孩子，“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成了家长们的口头禅。实际上，向成功者学习往往是不可行的，因为成功者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普通人学不来的。向失败者学习，规避他们之所以失败的因素，也许是可以做到的。通读《梁启超家书》，我没有看到梁启超要求孩子向某位名人学习，提醒孩子吸取失败者的经验教训倒是有的。他反对徐志摩迎娶陆小曼，不仅在证婚词中教训两位新人，在家信中也不讳言自己的态度。他对孩子们说：“青年们为感悟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这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他告诫孩子们：“品性上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真是可怕。”

唐朝诗人张籍写道：“欲作家书意万重”，家书也许无法承载亲人的千般思绪与万般柔情，但是只要用心写，亲人总是可以感觉到的。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州市杂文学会副主席）

【文化杂谈】

欲作家书意万重